

宁波文史系列丛书

第二辑

政坛名人

民国政治舞台上的浙东人物

115 中国文史出版社

序

王 永 杰

编纂出版一套反映近现代宁波籍人士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活动的情况,从一个侧面揭橥近现代宁波区域个性的系列丛书,是我们酝酿已久的一个想法。产生这一想法的最初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感到宁波在激宕剧变的近现代中国是占有一定分量和位置的一个区域,虽然她在中国版图中所占比例甚小,然而生发出来的生活观念和经营实绩却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掀起了持续的冲击波。这一现象可以从多个层面加以诠释,且已引起了不少海外学者敏锐而热情的关注。遗憾的是,我们国内特别是宁波本地鲜有深层

次研究，以致人们往往对宁波这一段丰厚历史相当隔膜。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长时期来对历史资料疏于系统积累、整理和介绍，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缺失。弥补这一缺失，政协文史资料理应承担一份责任。为此，我们将我们的工作角度稍稍作了转换，从“三亲”史料外延至资料整理，并力图与普及历史知识进而与近现代区域史研究接通管道。

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即是探寻曾经存在过的区域个性，为当前正在进行的宁波文化建设和未来文化发展规划提供借鉴。事实上，探寻曾经存在过的区域个性是一个需要为之付出艰辛努力、融各个学科方法于一体、宏观描述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巨大课题。我们不敢亦无力奢望通过一套丛书就能把区域个性揭示清楚，我们只是想通过对曾经拥有过的历史现象（这里仅以历史人物为聚焦点）作一番尽可能客观而系统的梳理与介绍，给人们认识近现代宁波区域及其特有个性提供一点可供思考的背景材料。揭示曾经拥有过的区域个性，是我们的理想目标，虽然目前尚无法达到，诚望文史爱好者和有心人共同来登堂探奥；建设现实文化和构筑未来文化发展框架则是一项巨大而艰辛的工程。这里所说的文化当然是一个大文化的概念，至少亦应有与经济、政治一样共托社会结构的地位。据此，我们认为，文化可以说是一个地区不同于其他地区的重要标志，是一个地区外在形象的个性化意蕴。所以，重视文化建设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自觉培植区域个性、保持区域特色的过程。而培植区域文化个

性，离不开对文化历史的考察，用费孝通先生的话来说，要对自身文化（包括历史和现状）有一个“自知之明”，这就是“文化自觉”，只有做到“自知之明”，才能“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见《读书》1997年第10期费孝通《跨文化的“席明纳”——人文价值再思考二》）。由此，我们很愿意告诉读者朋友，从酝酿筹划这套丛书的起始，我们就把它当作一项文化积累和建设性工作来做，并期望所有宁波籍人士和关心支持宁波文化建设的朋友从本丛书所胪列的人物现象引伸开去，从各个角度关注、探究产生这些人物现象的母域社会结构律动与社会价值体系嬗变的背景和客观走向，从而为宁波现实文化和未来文化如何赓续传统、超越传统、塑造富有活力的新个性贡献良智善策。

本丛书共分三辑，其中第一辑为经济方面的人物专题，名为《商海巨子——活跃在沪埠的宁波商人》，通过对晚清以来特别是近现代时期宁波籍著名实业家、商人在上海滩经商始末的详尽记述，揭示宁波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所占有的某种特殊地位；第二辑为政治方面的人物专题，名为《政坛名人——民国政治舞台上的浙东人物》，通过对民国时期从宁波乡间一步步走向中国政治舞台的一大批人物个体史料的梳理与汇集，明晰民国时期宁波社会的价值变动之繁杂性；第三辑为文化方面的人物专题，名为《文化群星——近现代宁波籍文化精英》，则通过一个个具体文化人的单体活动或一个个文化家族的群体发展的描述，凸现近现代宁波社会的文化氛围与文化场

景。这三辑内容，在我们看来，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印证，分之独立成篇，合之浑然一体。需要说明的是，近现代宁波籍名人成千上万，且大多在外埠活动并产生影响，囿于条件所限，收入本丛书的仅仅是其中极小部分。如果假以时日，各方条件许可，那么我们将会继续作出努力。

本丛书是名副其实的集体协作成果。无论是选题与写作体例的确定，还是入选稿件的统改，都是在众人友好讨论气氛中得以进行和竣工的。虽然各个作者写作风格各有不同，但从总体上看，我们原先确定的本丛书采用述评体写作方法，以述为主，以评为辅，述的部分力求平实稳妥，评的部分力求公允客观，使之史料性、可读性、学术性有机统一的目标已基本达到。需要说明的是，本丛书所选录传主的排列先后以出生年月为准。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真正成为读者进一步了解宁波近现代历史的一道风景线，更希望广大读者对丛书的不当乃至错误，不吝赐教。

是为序。

1997年11月

总 编	王永杰	
副 总 编	成岳冲	陆冰杨
	宋静之	俞维钧
本辑主编	王慕民	
副 主 编	屠文淑	

目 录

前言：试论民国政坛上的浙东人物	王慕民	(1)
赵氏三杰 兄弟同道		
——记赵家蕃、赵家荪、赵家艺	周利萍	(19)
外交先驱 体育名宿		
——记王正廷	屠文淑	(39)
执掌后勤 主持交通		
——记俞飞鵬	李小红	(61)
入则从政 出则为学		
——记蒋梦麟	余子道	(82)
光复浙江的义军临时都督		
——记童保暄	唐燮军	(114)
蒋家王朝的最高统治者		
——记蒋介石	潘如龙	(138)
民国时期国际宣传的主将		
——记董显光	余子道	(167)
纵横于学界与政界之间		
——记翁文灏	梁敬明	(203)
蒋氏“文胆” 宦海苦航		
——记陈布雷	贺秉元	(214)

青年导师 英年早逝

——记杨贤江 朱雪芬 (230)

领导农运 献身革命

——记卓兰芳 沈心康 (259)

学者从政 捐躯沙场

——记朱镜我 王慕民 (278)

白区红心 九死未悔

——记沙文汉 王泰栋 (312)

理论实践 “功盖群儒”

——记吴亮平 杨兵杰 (337)

从“尼古拉”到“接班人”

——记蒋经国 俞婉君 (362)

前言：试论民国政坛上的浙东人物

王慕民

步入近代以后，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旷世未有的激剧变动。1912年创建的中华民国，便是这一变动的产物。在历时37年的中华民国史上，浙东宁波曾经产生过一大批弄潮政坛的风云人物。他们虽然可以划分为不同的政治集团，对历史发展起过积极或消极的作用，而且大都少小离乡，在政海沉浮经年，但却带有某些共通的特点，反映他们与母域社会有着割不断的情结。以下，即就他们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地位、作用，所呈特点，以及与母域社会的关联，作一点粗浅的探讨。

为界定研究范围与对象，本书所指“浙东”地域以1945年8月浙江省第六行政专员公署所辖之鄞县（含宁波城区）、慈溪、镇海、奉化、宁海、象山、定海以及

余姚 8 县区为限,大致与现宁波大市的辖区相当(除定海)。所定时限,当然以民国所在的 1912 年至 1949 年为主要审视范围。所谓“浙东人物”,主要是指在浙东接受早期教育后一步步走上中国政治舞台的宁波籍人士。

—

宁波面积不足全国千分之一,人口仅占全国二百四十分之一,然而在民国时期短短的 37 年间,却涌现出数十名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他们中一人当过国家元首和执政党领袖,三人当过政府首脑,数十人当过中央政府和国共两党的部长或相当于部长一级的职务。这种现象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是绝无仅有的。

如以本书所收的 17 位传主而言,在南京临时政府、北京政府、南方护法军政府和广州国民政府中,王正廷担任过临时参议院副议长、参议院代理议长、外交总长、代国务总理等要职,赵家蕃当过制币局局长,童保暄当过浙军第一师师长、闽浙援粤军副总司令,蒋介石当过大本营参谋长、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常会主席,俞飞鹏当过黄埔军校筹备委员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兵站总监,未收入本书的范贤方担任过国法院院长,周骏彦担任过黄埔军校军需部主任;在南京国民政府中,蒋介石担任过政府主席、总统、行政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总裁,翁文灏担任过经济部长、行政院长,俞飞鹏当过交通部长、粮食部长和陆军上将,王正廷当过外交部长,蒋梦麟当过北京大学校长、教育部长和行政院秘书长,陈布雷当过侍从室第二处主任、教育部副部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军事委员会、最高国防委员会副秘书长,董显光当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行政院新闻局长,张其昀和蒋经国分别担任过国民党总裁办公室秘书组长和资料组长等要职,未收

入本书的张寿镛担任过财政部副部长，叶公超担任过外交部常务次长，徐培根担任过军委会航空署长、陆军大学教育长，俞济时担任过七十四军军长、集团军副总司令、国民政府军务局局长，沈瑞年担任过七十五军军长。至于部长、军长以下的政界、军界人物，更是不胜枚举。在共产党系统中，吴亮平担任过苏维埃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之职，朱镜我担任过上海中央局和东南分局宣传部长、新四军宣传部长，卓兰芳担任过浙江省委书记，沙文汉担任过江苏省委代理书记、华中分局城工部长，杨贤江也担任过左派领导的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常务委员等职。

他们中隶属国民党系统的手握大权，左右政局，执掌民国政权达 22 年之久；隶属共产党系统的也位居要津，表现不凡，因而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记。

为正确衡定民国时期浙东政治人物的历史作用，我们不妨分阶段来作一番具体的审视。

在辛亥革命时期，以赵家艺、童保暄、王正廷、蒋介石为代表的浙东政治人物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中华民国的创建立下了卓著功勋。如赵家艺兄弟在沪出资创办“竖三民”（《民呼报》、《民吁报》、《民立报》），在甬建立同盟会支部，为革命奔走呼号；武昌起义爆发后，又在宁波主持光复大计，并出任军政分府参谋部长等要职。留学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卢成章应同盟会人之召，在光复浙东中留下了“单骑克宁波”的佳话，并出任宁波军政分府的外交兼交通部长。年仅 25 岁的童保暄被推举为临时都督，指挥领导了光复杭州之役。正要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报到深造的蒋介石在接到陈其美电召后，毅然回国参加了光复上海、杭州的斗争。俞飞鹏，乃至虞洽卿等甬籍商人也参与了光复上海之役，其中虞还被推为沪军都督府的顾问和外交次长。1905 年即在东京结识孙中山并参加同盟会的王正廷，则出任打出

首义之旗的湖北军政府外交副主任，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又以参议院副议长的身份，参与制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浙东政治人物大都追随孙中山，为维护民主共和，打倒北洋军阀而继续奋斗。先是参加反袁护法斗争，如王正廷在北京领导参议院否决袁世凯的“善后借款”；蒋介石在上海投身“二次革命”，策动旧部九十三团反正，而后又参与“肇和之役”；童保暄在杭州响应护国，驱逐袁世凯死党朱瑞，领导浙江第二次独立；董显光则以报刊为武器，揭露袁世凯是“宋案”元凶，并多次出席孙中山召开的秘密会议，共商倒袁大计。当孙中山南下广州揭橥护法大旗后，王正廷、蒋介石、俞飞鹏、范贤方、周日暄等先后赴粤与孙中山共同奋斗。其中当然也有少数例外，如童保暄为保持权位，革命意兴渐消，再加上出身光复会系统，与孙中山关系较疏，因而在1917年至1919年的最后两年中，离开了革命轨道而依附于北京政府。在五四运动中，蒋梦麟曾支持爱国学生和“三罢”斗争，并当选为上海商学工报联合会干事；杨贤江在南京和陶行知等一起上街游行，并称赞“五四运动是个我国学生界划一新纪元的伟大运动”；^①年仅18岁的张其昀作为宁波学生联合会的代表，赴沪出席全国学联成立大会，会议强调全国学联的宗旨是：“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以新思想建设新中华”；王正廷作为全权代表之一，在巴黎和会上第一个明确表示“我不签字”，^②制约了妥协退让，维护了国家尊严。进入国民革命阶段，浙东政治人物在创建黄埔军校、东征讨陈和北伐战争中，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如在北伐时期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中，除担任总司令的蒋介石外，俞飞鹏任兵站总监兼江西财政委员会委员长，陈倬任参谋处长、军务处长，王任叔任秘书处机要科长。应

^① 见本书所载《青年导师 英年早逝——记杨贤江》一文。

^② 见本书所载《外交先驱 体育名宿——记王正廷》一文。

该一提的是，新一代的浙东人物在这一阶段开始显露头角，如卓兰芳、沙文汉等在宁波从事工农运动；俞济时、王世和、裘古怀等去广东报考黄埔军校；吴亮平、蒋经国、崔晓立等在上海参加五卅运动，不久又去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杨贤江更一度成为上海政界的风云人物，并且参与了工人武装起义和临时市政府的组织领导工作。

从1927年“四·一二”政变到整个十年内战时期，随着阶级矛盾的激化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前一代浙东政治人物基本上退出革命阵营，由推动民主革命前进的动力转而成成为阻滞历史进步的消极力量。当然，“九·一八”事变，特别是1935年华北事变后，随着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他们与汪精卫派不同，政治态度逐渐有所变化，政治重心也开始由对内“剿共”向抵御外侮缓慢转化。如地质学家翁文灏，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保全国土”而介入政治，应邀出任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和行政院秘书长。此外，这十年间上述人物在整顿教育、发展科技和进行国家基本建设方面，也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而以杨贤江、卓兰芳、朱镜我、吴亮平等为代表的新一代浙东政治人物，则与他们的前辈分道扬镳。他们有的在江、浙、沪、鄂等地组织工农，以武力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有的直接参加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或到苏区参与创建领导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有的则在上海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革命思想，组建左翼文化统一战线，在粉碎国民党文化“围剿”的斗争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如在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中，就有朱镜我、杨贤江、吴亮平3位宁波人，其中朱镜我还主持过共产党在整个国统区的宣传工作。

在抗日战争时期，浙东政治人物不管从属那个系统，几乎全部参加了捍卫民族生存权利的斗争。以蒋介石为首的那一派浙东政治人物，领导了国民政府在前方面战场和后方外交、宣传、军

需筹筹等方面工作。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他们对外抗战的积极性有所下降，对内反共的倾向有所上升，并在局部地区制造严重摩擦（如皖南事变）。从属共产党系统的新一代人物，更是毫无保留地投身到八年抗战之中。他们动员组织民众，参与创建发展敌后战场，特别是开辟了作为敌后战略区之一的浙东抗日根据地，为打败日寇和民族复兴，立下了不朽的功业。至于傅筱庵、袁履登等在上海沦陷后参加敌伪政府，则是个别现象，他们是浙东人物中的败类。

在解放战争时期，随着主要矛盾的变换，国民党系统的浙东政治人物充当封建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坚持独裁、内战，再一次走向历史的反面，并最终被人民所抛弃。共产党系统的浙东人物则为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和新中国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

综观从1905年同盟会成立到1949年民国终结这44年历史，浙东政治人物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国民革命和抗日战争的30年间，基本上顺应历史潮流，有功于国家的独立、统一和民主、进步。而从国民革命末期到十年内战终结，以及解放战争这十四年间，浙东政治人物中以蒋介石为首的那一批人，则逆历史的潮流而动，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但是新一代浙东政治人物中的多数，仍然高扬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旗帜，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复兴而英勇奋斗，不少人还为此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①

^① 如1928年，卓恺泽在共青团湖北省委书记任上牺牲，曾任共青团广州市委秘书长的沙文求在广州牺牲；1930年，曾任叶挺所部24师政治部宣传科长的袁古怀和卓兰芳在杭州牺牲；1931年，杨贤江在日本长崎去世；1933年，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应修人在上海牺牲；1941年，朱镜我在皖南事变中牺牲，崔晓立也在宁波家乡被顽固派杀害。

二

浙东政治人物虽分属不同政治集团，年龄相距又远，如赵家蕃与蒋经国即相差38岁之多，但只要深入考察，便不难发见他们中有很多别具一格的特点。现主要以本书所收这17位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人物为例，稍作一些分析和归纳。

从家庭背景来看，大多出身在商人和知识分子家庭。其中出身商人之家的有8人，占总数的 $\frac{1}{3}$ 。^①如蒋梦麟出身钱商，蒋介石出身盐商，陈布雷出身茶商（兼营钱庄）。翁文灏家层次最高，其祖父曾有过内阁中书的功名，可谓是官宦绅商之家，但到其父亲时即已专心“承祖业经商”。^②应该指出的是，这些家庭除经商以外，还都置有田产，用解放后的话来说，属于工商地主一类。出身耕读之家的有5人，如童保暄、沙文汉的父亲是医生，朱镜我、吴亮平的父亲是教师，也占总数的 $\frac{1}{3}$ 。余下的 $\frac{1}{3}$ 则为农民、手工业者等地位更低的家庭，如杨贤江的父亲是裁缝，俞飞鹏的父亲以相命、占卦为业，董显光则10岁时便尝过下田务农的滋味。这种商人和知识分子的家庭背景，使他们对社会的变动比较敏感，因而能比较早地投身到民主革命之中。

从所受教育来看，文化程度很高。上述17人中，出洋留过学的有11人，占总数的 $\frac{2}{3}$ ，其中留日4人（赵家蕃、赵家艺、蒋介石、朱镜我），留俄3人（吴亮平、蒋经国、沙文汉），^③留美3人（王正廷、蒋梦麟、董显光），留比1人（翁文灏），而且有两人获博士学位，

① 赵氏三昆仲和蒋介石父子，5人出自二个家庭，故言占数的三分之一。

② 翁文波等《地质学家翁文灏》，《浙江文史集粹》第5册，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出版。

③ 沙文汉也曾去日本留过学。

两人获学士学位。在这 11 人中,除蒋梦麟和赵氏昆仲系自费留学外,其余 8 人均由官费公派或团体资助。在剩下的 6 人中,也均受过中等以上教育,其中大学毕业的有陈布雷。比较高的文化素养,使他们在政治活动中较易发挥作用,并获得发展的机会。

从本身的禀性、资质来考察,大多比较文弱,活动领域也集中在文化宣传、经济财政、军需后勤以及外交等方面。除蒋介石之外,王正廷、翁文灏、蒋梦麟、俞飞鹏、陈布雷、董显光等均系技术、管理型官僚,缺少善于纵横捭阖的风格,就是连陈果夫兄弟那样的人物也并不多见。同样,书中所收 5 位共产党政治人物,除卓兰芳外,其余 4 人主要从事并擅长的也都是文化宣传工作。在军事活动方面,上述特点也表现得相当明显。虽然在辛亥革命时期就有不少浙东子弟投身军界,如童保暄、蒋介石、俞飞鹏,稍后又有毕业于保定军校和德国参谋大学的徐培根,国民革命时期更有周骏彦、陈倬和俞济时、王世和、沈瑞年、蒋坚忍等一大批人进入黄埔军校和北伐军中,但是除蒋介石之外,他们之中没有出过在全国叫得响的战将,他们在军中扮演的多为参谋、军需、政工、侍从之类的角色。^①就是以由军事起家的蒋介石而言,1925 年前担任的主要也是参谋性质的工作,综观其一生的军事活动,也只是个政治型的军事人物。这一点同河北、湖南、安徽、广东甚至浙江某些地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与上述情况有所联系的又一特点是多亦政亦商和政学两栖人物。亦政亦商的现象在前一代浙东政治人物中较为多见,最为典型的如赵氏昆仲和卢成章,此外,袁履登在辛亥革命后由甬去沪从事商业活动,王正廷在民国最后十年间弃政从商,

^① 曾为方面统帅的胡宗南虽出生镇海,但不久即举家迁往孝丰,与本书和本文所指“浙东人物”含意不符,故未将其列入审视范围。《辞海》胡宗南条也说他是“浙江孝丰人”。)

董显光在抗战胜利后两度学艺准备开设汽车维修铺，就是蒋介石也曾上海当过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济人。至于由学入政、政学两栖的现象，在两代和两个系统的政治人物中都很常见。比如蒋梦麟以教育专家入仕，翁文灏以地质学家入仕，陈布雷曾长期在效实中学和新闻界任职，袁履登也以斐迪学校教务主任出任宁波军政分府的外交部副部长。在共产党方面，杨贤江是著名的教育家，朱镜我则是颇有造诣的社会科学家，卓兰芳曾当过七八年小学教员，吴亮平也是很有名的翻译家。民国时期浙东重要政治人物集中成长于两个时期，一为辛亥革命酝酿期，二为五四运动前后，其中前一代大多属同盟会、国民党系统，后一代则大多为共产党系统。

从宗教方面来考察，浙东政治人物中的不少人与基督教有特别深的关系。其中王正廷、董显光出身基督徒家庭，从小就受洗礼，以后又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并受教会资助去美国留学，他们的命运与教会密切相连。学政商三栖的袁履登，早年毕业于教会所办的宁波斐迪学校，以后又靠伦敦履登街教会的奖学金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深造，为表达感激之情，竟将名字也改为“履登”。此外，翁文灏毕业于法国天主教会所办的上海震旦学院；蒋梦麟曾在上海、杭州的教会学校读过书；蒋介石、俞飞鹏则“半路改嫁”，分别在中年、晚年皈依基督教。

从地域方面来考察，浙东重要政治人物集中来自宁波城区和靠近城区的几个县。以本书所收人物为例，17人中来自城区和距城区较近的鄞县、慈溪、奉化三个县的即有14人之多，他们的出生地都分布在距宁波城区30公里的范围内；来自余姚的有两人，来自宁海的一人。由于所收人数不多，计量分析不一定精确，但在近代，作为区域中心的城市和靠近城区的地方比远离城区的乡镇更容易造就人才，却是不争的事实。